

随思录

诸葛亮的诫子之道

姚志明

诸葛亮有两子：长子诸葛乔、次子诸葛瞻。诸葛乔是诸葛亮之兄诸葛瑾的第二子，诸葛亮婚后没有子嗣，于是向诸葛瑾“求乔为嗣”，但诸葛乔于蜀汉建兴六年（公元228年）过世，年仅25岁；诸葛瞻系诸葛亮与妻子黄氏所生独子，诸葛瞻与他的长子诸葛尚都在成都保卫战中战死了，诸葛瞻次子诸葛京逃过劫难，在晋王朝任眉令，后升至江州刺史。诸葛亮唯一的孙子得以保全，也算苍天有眼。

《诸葛亮集》中有《诫外生书》《诫子书》《又诫子书》。诸葛亮去世时，独子诸葛瞻年仅8岁，《又诫子书》是专门谈酒事的，诸葛亮不可能与8岁儿子谈饮酒这个问题，因此应该都是写给已成年的诸葛乔等子侄、外甥辈的。

《诫外生书》曰：“夫志当存高

远，慕先贤，绝情欲，弃疑滞，使庶几之志，揭然有所存，侧然有所感。忍屈伸，去细碎，广咨问，除嫌吝，虽有淹留，何损于美趣，何患于不济！若志不强毅，意不慷慨，徒碌碌滞于俗，默默束于情，永宰伏于凡庸，不免于下流矣！”

《诫子书》曰：“夫君子之行，静以修身，俭以养德，非澹泊无以明志，非宁静无以致远。夫学须静也，才须学也，非学无以广才，非志无以成学。淫慢则不能励精，险躁则不能治性。年与时驰，意与岁去，遂成枯落，多不接世，悲守穷庐，将复何及！”

上述两封书信，诸葛亮从“修身”谈到“接世（治国安邦）”，每个环节都是递进的、互为因果的，展开来都是一篇大文章。这里略谈一下他的交友和拜师之道。

“才须学也”，学习是离不开朋友和老师的。诸葛亮结交的朋友有

徐庶、石广元、孟公威、庞统等；老师知名的有庞德公、司马徽、黄承彦等。诸葛亮在《论交》中说，“势利之交，难以经远。士之相知，温不增华，寒不改叶，能贯四时而不衰，历夷险而益固”。可见，诸葛亮十分重视所交朋友是否品德高尚。顺便提一段“野史”：诸葛亮出茅庐前，曾到汝南灵山师从名士鄢玖，但老先生“居期年，不教”，几年内不肯教导诸葛亮。古代高士收徒教习，往往以屈辱、冷淡考验学生，汉代张良师事下邳圯上老人即其例。面对老师不理不睬，他没有灰心，而是“奉事性谨”。鄢公“知其虔（诚），始出《三才秘录》《兵法阵图》《孤虚相旺》诸书，令（诸葛亮）揣摩研究百日，（鄢）玖审其所学皆能致其奥妙”。日后，诸葛亮能预料天下之势，向刘备献《隆中对》，与名师教导，高朋切磋是分不开的。而

现在的年轻人，结交哪些朋友？请教过哪些名师？不可不思之。

除了《诫子书》和《诫外生书》，还有两封书信，也体现了诸葛亮为后代谋将来的殷殷之情。诸葛亮病重五丈原时，写信给在东吴的兄长诸葛瑾，谈对诸葛瞻的看法：“瞻今已八岁，聪慧可爱，嫌其早成，恐不为重器耳。”诸葛亮考虑到自己长年在外国领兵，对儿子当面言传身教甚少，其聪慧主要是妻黄氏家教及本人天资所致，这种“早成”不免有所局限。史载诸葛瞻“工书画，强识念，蜀人追思亮，咸爱其才敏……美声溢誉，有过其实”。说明诸葛瞻有文才，但缺少理政治国之才。究其原因，除了他不曾领兵作战，缺乏实践经验外，与阎宇、黄皓、陈祗等奸佞相处共事不无关系。

蜀汉后期，姜维常征伐在外，尚书令樊建与尚书仆射（樊建副

手）诸葛瞻共统朝政，黄皓窃弄权柄，樊建“不与皓和好往来”，但诸葛瞻与其他大臣“咸共将护，无能匡矫”（《诸葛亮传》附诸葛瞻）。诸葛瞻临死时曾说：“不早斩黄皓，以致倾败。”此时自责已经晚了。诸葛瞻与奸佞随波逐流，辜负了老父期盼。“恐不为重器”，知子莫若父，诸葛亮的评价不幸言中，后人既叹服孔明之神，更哀惜诸葛瞻不得其父真传。

另一封信是为侄子诸葛恪所写，是诸葛亮临终那年写给东吴执政者陆逊的。信中说：我的胞兄（诸葛瑾）年老，而侄子诸葛恪生情粗疏，让他掌管调运军队粮谷，我心中不安，请您禀告贵国主上调换他的职务（《吴书·诸葛恪传》裴注引《江表传》）。诸葛恪才思敏捷，因此孙权让他去做粮谷节度官。陆逊转述后，孙权听从了诸葛亮的建议。史实证明，因诸葛恪“生性粗疏”“恃才傲物”“轻敌黷武”“专断孤行”，最终在东吴的一场政变中，陨首宴席，被诛灭三族。

尽管诸葛亮子侄结局大都不好，但从上述两封信中可见，诸葛亮望子成才心切，对子侄的弱点洞若观火。诸葛亮为子侄谋的不是权柄、财产，更不是包庇、荫护，而是指出不足或瑕疵，为子孙长远谋划。想着既利子侄，又利国家，真

是不同凡俗。

诸葛亮以“淡薄”作为修身的根基，以“接世”为最终目标。“接世”的业绩世人皆知，那“淡薄”做得如何呢？不妨看看他的两追临终遗命。诸葛亮在遗命中指出：“因山为坟，冢足容棺，敛以时服，不须器物。”诸葛亮病逝五丈原，下葬于汉中定军山上，从坟冢规模 and 陪葬物看，作为一国丞相，的确是非常简单朴素，名相的淡薄风范足为后世楷模。诸葛亮生前曾上书后主刘禅公布他的财产状况：“臣初奉先帝，资仰于官，不自生志。今成都有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顷，子弟衣食，自有余饶。至于臣在外任（出征在外），别无治生，以长尺寸。若臣死之日，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赢财，以负陛下。”日后刘禅派人清点其遗产，果如其言。

诸葛亮不是完人，但他始也淡泊，终也清廉。“不使内有余帛，外有赢财”的警示之言，余音绕梁，不绝千秋。古人奉为经典的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，被诸葛亮演绎得淋漓尽致。最主要的是修身：诸葛亮主张淡薄（泊）、宁静、养德、治学。前几步走对了，德学兼备才能明志，才能成才，才能立定志向去“接世”。儒家的修齐治平与诸葛亮诫子之道，可谓异曲同工。

漫画角



消息树

王铎 绘

老话新聊

好日黄狗窜弄堂

桂晓燕

阿拉宁波历来有一个风俗，正月里“好日”人家多。这“好日”两字是正宗的宁波老话，字面意思为好日子，特指结婚吉日、大喜日子，也可以指结婚、拜堂。这个“好”字要念第四声，“日”字要念宁波方言音，老宁波都有数哦。今天就来聊聊宁波的“好日”话题。

提起“好日”，首先想到一句宁波老话——“好日黄狗窜弄堂”。好日那天肯定是张灯结彩，宾客盈门，欢声笑语，热闹非凡。家里的黄狗见状兴奋不已，不断地在弄堂（墙门的过道）里窜来窜去，那叫一个起劲！这句老话，从一个特殊的角度，形容了好日的闹猛喜庆。顺便说一下，老宁波习惯将所有的狗狗泛称为“黄狗”，黑狗叫“黑黄狗”，白狗叫“白黄狗”。嘿嘿！

提起“好日”，又想到一个宁波习俗——新娘子坐龙凤花轿。这龙凤花轿描龙雕凤，镶珠嵌玉，金碧辉煌，号称“半副銮驾”，除了皇帝的后妃，只有宁波女子出嫁时能坐。据传说，南宋建炎三年底，宋高宗赵构被金兵一路追击，逃到明州（今宁波）高桥。正在走投无路之际，见到一个晒谷的村姑，便慌忙求救。村姑急中生智，将赵构倒在在谷

箩里面，自己坐到箩底上。顷刻间金兵追到跟前，逼问赵构去向，村姑随手往远处一指，引走金兵，赵构因此逃过一劫。为感谢村姑的救命之恩，赵构答应回京后封她为皇妃，让她到时将身上围着的布襦（一种短围裙）挂在家门口，作为标记。谁知村姑的母亲走漏风声，当后来高宗派人前来迎接村姑时，只见村里家家户户门口都挂着布襦，无法辨认。高宗找不到救命恩人，只得封宁波女子出嫁时可享受皇妃待遇，坐龙凤花轿，以表其感恩之心。

在这件事情上，赵构好像还有点良心。不过，当皇帝的老婆可不是什么好事。相比之下，笔者更喜欢另一个版本（此传说在宁波有好几个版本）。同样的村姑救驾故事，发生在镇海涨镬碇。村姑不愿意当皇妃，主动请乡邻们都挂出布襦，让高宗派的人找不到自己，躲过了进宫的命运。联想起媒体曾报道过，现在有些女孩子，受热播的清宫戏影响，对宫廷生活无比向往，恨不得穿越到古代，去当什么娘娘、格格。其见识着实不如这个村姑，也不如《红楼梦》里的贾元春。已经当上了皇妃的元春，看透了皇宫是“不得见人的去处”，可谓一针见血。

提起“好日”，还想到一个宁波特色——“好日墙门”。老底

子，不少宁波人喜欢租借传统的“好日墙门”办喜事。好日墙门场地宽敞，功能齐全，办“好日酒”所需的炊具锅灶、桌椅板凳、碗筷杯盘之类应有尽有，收费也比较合理。好日墙门位于孝闻街市府第一招待所斜对面，虽然早已不复旧日风光，但建筑尚存。我的姑妈就住在附近，她说，小时候常看到好日墙门的天井里，停着漂亮的花轿。当然啦，花轿也是用于出租的。新郎租了花轿，就可以把新娘子抬到这里来拜天地了。

总而言之，老宁波对待“好日”的态度是，既要热闹喜庆，也要量力而行。宁波老话是介讲：“结婚摆阔气，婚后嘅柴米。”“后山黄泥要吃粥，大手大脚无底洞。”“勤俭节约勿是小气，奢侈浪费并不光荣。”……像那种办一场婚礼狂砸亿万，挥金如土、高调冲天的做法，除了给社会风气带来不良影响，证明某些人来钱太容易以外，还能证明什么呢？你的婚礼再豪奢、再风光、再吸引眼球，能比得过当年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的“世纪婚礼”吗？可遗憾的是，他俩后来分道扬镳了。可见婚礼的“含金量”，与婚姻的质量并不成正比。

追求“好日”的精彩无可厚非，“好日”之后两个人能过上天长地久的好日子，才是更精彩的。

说法

商业化本身是没有错的，很多小镇就是因为商业的集聚产生的。过去的商业形态适合了手工业、农业时代人们的所需，但时代在进步，生活方式在改变，我们要思考的是怎样做让人不讨厌的商业。乌镇街区卖什么，以什么方式什么价格卖，都经过了详细的研究，没有出现重品。每一次开发保护，都应该怀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。每个小镇都有自己的特点，我们的责任在于挖掘它，保护它，发扬光大它。

——乌镇景区、古北水镇（北京）景区总规划师、设计师及总裁陈向宏

对于我们很多所谓的传统媒体，我最担心的是，以失去自己竞争力的方式去拥抱未来。我们过去是种粮食的，我们的优势也在于此，但现在有多少传统媒体在认真种粮食？想种好粮食有三个条件必不可少：多一点人，多一点投入，多一点时间。不少传统媒体做新媒体后，自己也开始炒菜了，但你炒得过人家吗？我认同互联网应当成为媒体，同时也要承担起媒体的责任。现在很多互联网媒体没有采访权，整天在当标题党，歪曲内容。这就是因为他们不种粮食，只是炒菜，不知道粮食有多珍贵，所以会随意糟蹋。我在想，为什么不给予互联网媒体采访权呢？当他自己也种粮食的时候，就知道粮食的珍贵了，才可能担起媒体的责任。

——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白岩松

数字

245: 1

——从2012年到2016年，上海戏剧学院迎来的考生数量从11448人增加到20996人。2017年2月，上戏迎来又一个招考大年，共有21782人报考。有6127人冲着仅招25人的戏剧影视表演专业而来，招录比达到245:1。

1.7亿人

——高血压、高血脂、高血糖是我们熟悉的“三高”，当我们和“三高”作斗争的同时，第四高已悄然袭来。它就是高尿酸。数据显示，目前高尿酸患者全国约有1.7亿人，超过了糖尿病1.14亿人，紧追高血压2亿人、高血脂3亿人。

50.3%

——截至2016年底，我国手机网上支付用户规模已达4.69亿人，有50.3%的网民在线下实体店购物时使用手机支付结算。而在移动支付技术向线下领域快速渗透并改变人们消费习惯的同时，这种“无现金”的支付方式却成为网络安全的“重灾区”。

社科书架



《文章自在》
张大春 著
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
2017年1月

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的这本新书《文章自在》，以七十余篇文字演绎文章之道，既谈他对文章写作和当前语文教育的看法，剖析常人习焉不察的种种说话恶习，也示范各种写作技巧。同时征引苏洵、鲁迅、胡适、梁实秋等古今名家文章，进一步阐述文章妙处、语言美好。

朱晨凯

每年高考结束，都会有数百万年轻人从此告别了“作文”。应试作文的种种不可取之处似乎人人都知道，但当离开了应试作文，是否能写好自己想要写的文章？现状恐怕不容乐观。即便是

要“写文章”，不要“作作文”

大学中文系的先生们，也未见得便当得起“会写文章”，更未必有许多人知道如何教文章。在台湾著名作家张大春看来，如果不能以写文章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，到头来我们所接收的成果就是一代人感慨下一代人的思想空疏、语言乏味、见识浅薄。套路化的作文固然不可取，但写文章绝非无“法”。张大春这本新书《文章自在》，某些程度上能将如何把“文章”写好这件事讲清楚。

在写作动笔之前，先要搞清楚自己要写的是文章还是作文，什么是“写文章”，什么是“作作文”。张大春在书中对“作作文”进行了“严厉批判”，他认为，今天自以为身处新时代进步社会的我们，每每取喻“八股”二字以讽作文考试，殊不知眼前的考作文还远不如旧日的考八股——因为八股讲究的义法，还能引发、诱导并锻炼作文章的人操纵文气，离合章句；条陈缕析，辨事知理。各级考试“诱导”考生学习作文所加强的，不是一种随身携带的能力，而是用后即丢的资格。人们通过了考试，却会打从心眼儿里瞧不起作文这件事：以为那不过一个跨越时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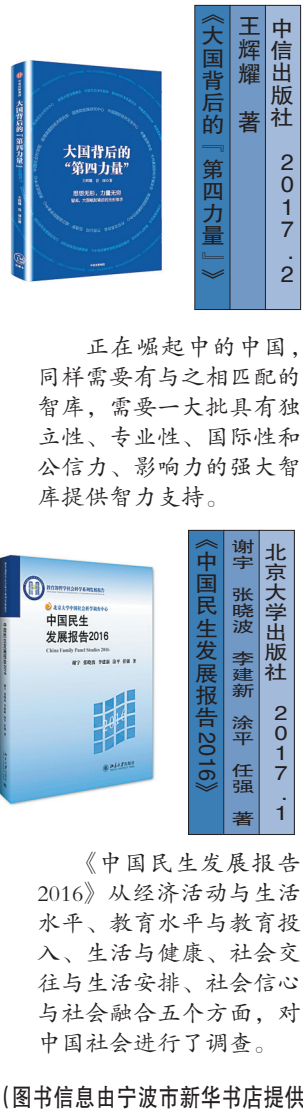
力，跨越后却可以“去不复顾”的门槛；一种猎取功名的、不得已而施之的手段。作文，若不是与一个人表达自我的热情相始终，那么，它在本质上是造作虚假的。

因此，张大春认为要“写文章”，而不是“作作文”。作文本是练习写文章，但在应试教育下的命题作文却与文章割裂开来：写文章，是我手写我口，是自主思想的训练；作作文，却是要揣摩出题人之意、应和题旨，学生往往编织语言疲于应付。文章本有法，可是真正让文章有妙趣、有神采、有特色、有风格的方法，非但不能经由考试鉴别，也不能经由应付考试的练习而培养。唯有以写文章的抱负和期许来锻炼作文，方可体会文章的乐趣，也才能培养一种随身携带的能力，因为写文章是一辈子的能力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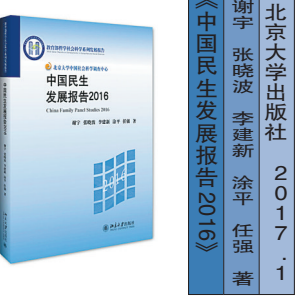
弄清楚要“写文章”还不够，对于大多数年轻的写作者而言，最大的困惑是“写什么”。似乎这个时代能够书写的越来越少了，从这层意义上讲，好文章从何处来呢？张大春指出，好文章是从对于天地人事的体会中来。

而体会，恰像是一个逛市集的人打从自己口袋里掏出来买东西的钱。如何累积逛市集的资本，可能要远比巴望着他人的口袋实在。能够写、值得写的东西，必须跟自己有一种迫不及待通过文字反思再三的关系。文章先要“率然”，率然不是任性，而是让严密组织起来的文章有一种诸般元素自然呼应的活性。文章中的大道理是隐藏着的，是不动弹的，好比佛经上那些发人深省的字句，它是一直在那儿等待读者会心一见，若有所得，这就是孙子所谓的“击”了。读者一击，文章乃应。

书中也指出了写文章时存在的一些问题，如今的人写文章，似乎更容易落入窠臼，或某种范式，青年人写一套文章，中年人写一套文章，看起来好像有共同的话语方式，读者提起兴趣阅读变得越来越困难了。张大春认为，今天我们说不会写文章，文章不好看，说穿了就是不会做人。不会做什么样的人呢？张大春的回答是：千万别以为答案是不会做好人，应该说今天的人不会写文章，全是因为我们不会做有趣的人。



正在崛起中的中国，同样需要与之相匹配的智库，需要一大批具有独立性、专业性、国际性和公信力、影响力的强大智库提供智力支持。



《中国民生发展报告2016》从经济活动与生活水平、教育水平与教育投入、生活与健康、社会交往与生活安排、社会信心与社会融合五个方面，对中国社会进行了调查。

（图书信息由宁波市新华书店提供）